

# 所有文学都是自传

## ——写在伊塔洛·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之际

付杰

今年是意大利当代文学大师伊塔洛·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在此之前，国内图书市场还没有推出过一部关于卡尔维诺的传记(包括译著)，考虑到这位伟大作家的地位与声名，不得不说是件有些奇怪的事。卡尔维诺的传记可能会迟到，但终究不缺席，日前，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塔洛·卡尔维诺：写小说的人，讲故事的人》，系文学大师中文版传记的首次面世。

卡尔维诺生于1923年10月15日，如今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小说家，并且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一样，同享“作家中的作家”之盛誉，其作品叙事精巧、风格轻盈，犹如繁复的迷宫，充盈着哲理与智性，给人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代表作有《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骑士》《命运交叉的城堡》《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等。

1985年9月19日，卡尔维诺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意大利的佩斯卡拉，当代文学星空的一颗璀璨星辰意外陨落。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卡尔维诺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因其猝然离世而与这一桂冠失之交臂。

### 让作家隐身，让作品显形

严格来讲，《伊塔洛·卡尔维诺》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传记。一个作家的传记，必须具备人生与作品两大要素，但该书对卡尔维诺的人生历程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按照时间序列将其一生分星劈两地呈现出来，而是重点剖析了其代表性的作品，以文学置换人生，以文本阐释代替生命展示。

出人意料但也解释得通。尼采说“所有哲学都是自传”，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文学领域，即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足以构成一部关于他的逻辑自洽的自传。这就像高尔基所倡导的“文学即人学”，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其私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的文学镜像，他们将写作视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实践文学对生活的提炼；抑或如齐奥朗所说，写作就是复仇，“对世界的报复，对我自己的报复。我所写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报复的产物。因此，它同时也能带来解脱。”卡尔维诺亦如是，他的人生虽然猝然而逝，作品却生命长青，那些小说就是他最好的传记，一部又一部，既是对他人生轨迹的忠实记录，也扩展成了他辉煌而又曲折的写作生涯。

对于传记，作家本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卡尔维诺尤为注重自我与写作之间的距离，他说，“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在小说《监狱人的一天》的作者注

中，他说他的作品“思考多于事实”，自传性的成分不应掺入其中。也即，与福楼拜、海明威、米兰·昆德拉等作家一样，卡尔维诺主张让作家隐身，让文字显形，其作品才是一个作家最好的传声筒，也是其人生最真实的画像。

从这个角度来讲，传记充分尊重了卡尔维诺的意愿，这也与本书作者让-保罗·曼加纳罗有关，他是卡尔维诺的法文译者，对这位作家有详细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在创作卡尔维诺的传记时，其预设的写作姿态是：“不会采取那种试图通过揭密者生活来呈现作品根源的传记方式，而只会以卡尔维诺的作品为这部传记写作的出发点和传主精神世界的入口。”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说明明确划分章节，但阅读的时候并非无迹可寻。毋宁说，卡尔维诺的小说就是本书的具体章节，每部小说既为本书的一章，亦是作家人生的一章。具体而言，曼加纳罗详略有致地剖析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最后来的是乌鸦》《波河青年》等作品，进入这些小说的文本，就是在“立体化”卡尔维诺的人生。毕竟，他的小说所蕴含的主题表达和思想脉络，与其个人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寻找到隐秘而坚实的锁钥，从而“打开”他的小说，并提供严丝合缝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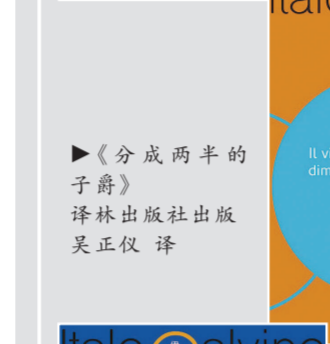
### “矛盾”的卡尔维诺

矛盾是曼加纳罗为卡尔维诺所做的心理画像之一，“这些矛盾限制了介入或决定的可能性，对矛盾的基本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卡尔维诺提出问题的方式。”这些矛盾既指其小说中的虚构时空，也存在于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两者糅合在一起，塑造了他对写作的看法。在文学事业上，《通向蜘蛛巢的小径》(1947年)是卡尔维诺的处女作，1964年他却在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如此说道：“最好从来不要写第一本书。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写他的第一本书，他就拥有一切自由。写作者一生中只能享用一次这样的自由。”如此说来，自处女作诞生的那一刻，卡尔维诺便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但他无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在另一重无边的自由中，他可以探访分成两半的子爵，可以对话不存在的骑士，可以进入命运交叉的城堡，可以邂逅寒冷冬夜的旅人。

颇为独特的家庭背景也是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之一，这又表现为卡尔维诺对自身的“否定”。他的家人都是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弟弟是地质学家)，只有他是写作者。在其半自传性作品《巴黎隐士》中，他说：“我是家中败类，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这个“败类”，如今成为了受人景仰的文学大师，也是这个地球上的荣誉居民，



《树上的男爵》译林出版社出版 吴正仪译



《不存在的骑士》译林出版社出版 吴正仪译



《分成两半的子爵》译林出版社出版 吴正仪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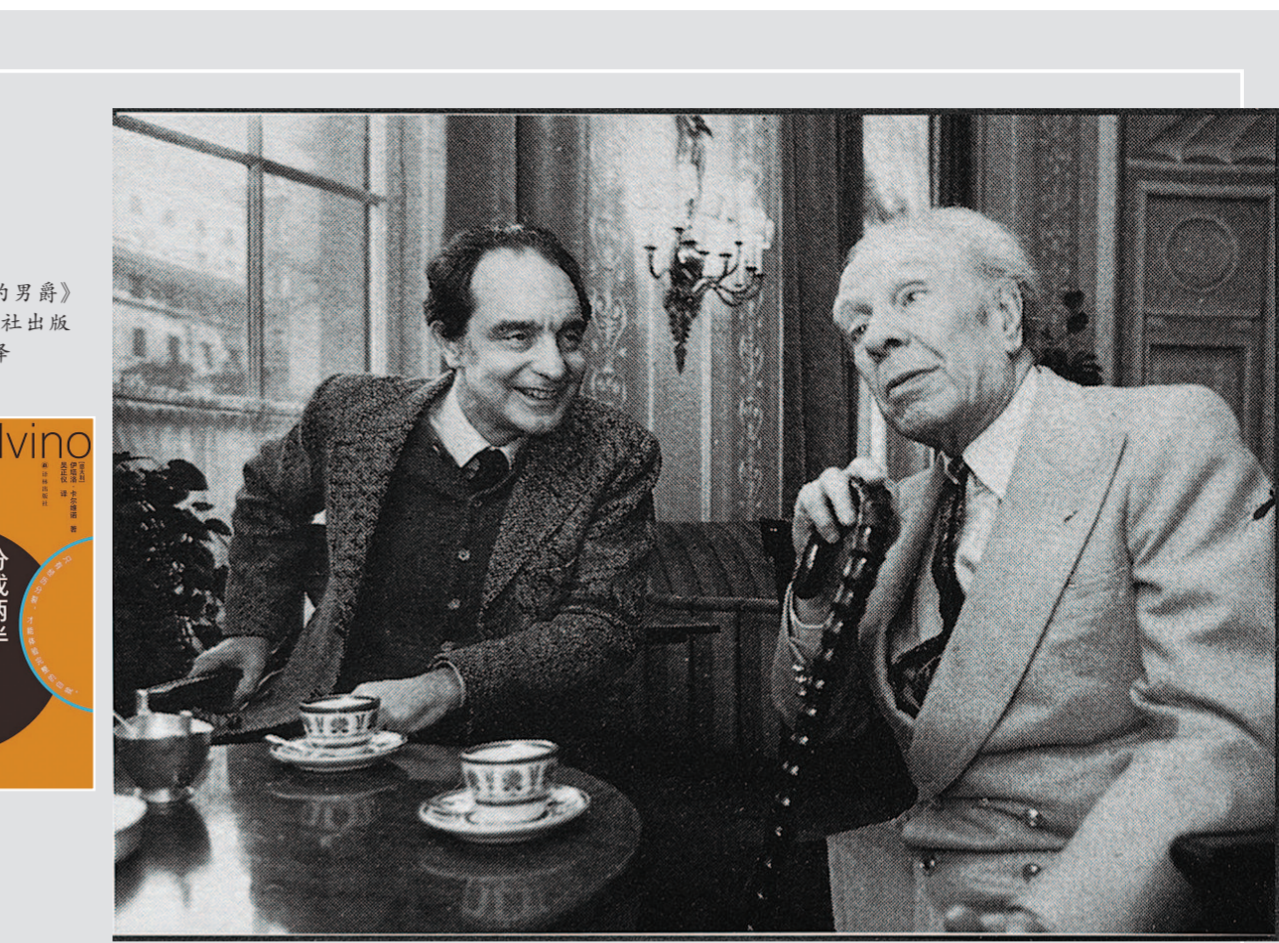
我倒希望多一些这样的“败类”。

这一矛盾也表现在政治信仰上。卡尔维诺的小说极少涉及政治，但他本人却对政治抱有热情，也相信文学可以推动政治改良、促进社会进步。在德国占领意大利期间，他参加意大利游击队，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

### 写作生涯与小说特征

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到《帕洛马尔》，卡尔维诺的写作生涯将近40年，其小说风格和作品特征也发生了几次明显的转变，这在本书中也有提及。总体而言，卡尔维诺的写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为新现实主义阶段。这是卡尔维诺写作的初期阶段，也是很多作家在“风格练习”时的稳妥选择，他在早期的作品中试图“证明写作者具有一种单纯的力量，能够表达所有直观可感而又不能立即被理性化的东西”。在这一时期，卡



▲卡尔维诺生于1923年10月15日，如今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小说家，并且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一样，同享“作家中的作家”之盛誉，其作品叙事精巧、风格轻盈，犹如繁复的迷宫，充盈着哲理与智性，给人以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图为卡尔维诺(左)与博尔赫斯(右)在罗马艾克塞西尔酒店的合影。(图片由译林出版社提供)

尔维诺书写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尤其取材于抵抗运动时期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最后来的是乌鸦》等小说。

其二为寓言与童话阶段，这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为重大的创作阶段。卡尔维诺被誉为“寓言式奇幻文学的大师”和“世界上最好的寓言作家之一”，他从意大利民间故事中汲取了大量的创作资源，融入了自身的观念和思想，创作了《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意大利童话》《马可瓦多》等寓言式作品，并在奇幻外衣的包装下，对现代文明状态下人的异化与物化、存在与虚无以及社会的种种弊病展开了别具匠心的探讨与审视，其中以《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最具代表性。

其三为后现代主义阶段。旅居巴黎期间，卡尔维诺与罗兰·巴特、列维·施特劳斯经常来往，还受到了福柯、拉康、索绪尔、德勒兹、德里达等思想家的影响，在其创作中融入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

作品开始转向后现代风格，如《宇宙奇趣全集》《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等。这类作品融合了传统与现实，在解构的同时不断建构，解码的同时亦不断编码，从而充满了丰富的喻指和意涵。也正因此，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盛赞卡尔维诺为“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在写作形式与技法以及小说文本的剖析上，传记以卡尔维诺的每一部作品为例，解剖麻雀，具体分析，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论述，向我们呈现了卡尔维诺作品的多个面向。比如，游戏与幻觉，“他不断在纸页上构造着游戏与幻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写作本身开拓成了游戏与幻觉。”比如，重事轻说。这一特征在其童话与寓言式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所谓的意在言外、轻描淡写，缩小表述的范围，尽可能为变化多端的能指提供饱满的意义。”比如，表象与真实。探讨真实是卡尔维诺作品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一概念转化为文学书写时，他尝试过对荒

诞进行再现……经过这样的再现，表象即使没有立刻改头换面，也自行模糊了轮廓。如此一来，表象成为一种捏造、一种无稽之谈。”比如，罗列与组合。这种写作手法既与卡尔维诺家庭环境中的科学精神有关，也与其自身的求学经历有关。罗列与组合的作用“在于巩固求知的进程，也有助于了解某个特定空间，能整体性地描述杂凑在一起的每一块碎片，亦便于将真实输入想象，将坚实的厚重注入原本的稀薄”。

通过这一部“特立独行”的传记，曼加纳罗反其道而行之，以卡尔维诺的作品为入口，通过小说的编年史还原了作家本人的编年史。而且，本书的书写也具有某种蒙太奇般的色彩，作者在阐释卡尔维诺小说时，也构筑了一座“小径分叉的花园”，我们得以自由驰骋穿梭于那些寓言与童话、游戏与幻象，进而感受卡尔维诺作品所蕴含的丰富与绚烂。

(作者为书评人)

# “情感学转向”与对《红楼梦》的再认识

詹丹

近年来，情感学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热点。虽然在西方世界，讨论人的情感问题，自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已经开启，并引发了后继的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的持续参与，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费弗尔发表他的相关论文，强调了“只要情感史还没有被完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的论断，使得他成为“情感学”确立的标志性人物，并在后续的时间里，有更多专家集中投入研究人的情感复杂因素以及对社会动向乃至历史走向发生的明显影响时，才有了所谓的“情感学转向”之说。

情感学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它涉及情感与身体、与理性的离合关系，涉及一种情感与另一种情感细微区分的可能，或者何以两种截然相反情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难分难解，也涉及个人的情感在群体中的感染与蔓延等，而作为情感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人的情感是自然天生的还是后天习俗培养的，换言之，基于生命科学的情感自然说和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情感建构说，给情感学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正是借鉴了这样的研究视野，使得我们面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关于从“礼仪之家”的人物身上延伸出的“大旨谈情”的主题，有了新的思考。

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和宝钗三人的情感关系，常被视为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的象征性对峙。木石表示质朴，金玉表示富贵。但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金锁之于薛宝钗、通灵宝玉之于贾宝玉，是摆在故事主体的明面中，而金与玉的相配，又是被薛宝钗的大丫鬟莺



▲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和宝钗三人的情感关系，常被视为木石姻缘与金玉姻缘的象征性对峙。图为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儿在小说中直接提及的。但草木之于黛玉、顽石之于贾宝玉的关系，却并没有在贾宝玉和林黛玉出生后的入回直接提及，也并不为世人所知晓，毋宁说，这是作为两人的前世传说，发生在一个神秘的世界里。这样，贾宝玉最多也只能在梦中，以自己与木石姻缘的认同，来抗争世人熟悉的金玉姻缘。同样，当我们解释贾宝玉对林黛玉倾情相许时，固然可以从理性角度，来分析林黛玉不说让贾宝玉追求功名富贵的混账话，以说明叛逆者的共同志趣是感情的基础。但他们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久别重逢的熟悉感，似乎又不是理性所能解释得清楚的，从而让这种近乎神秘的感觉，给男女情感互生爱慕的非理性

留出了空间。

小说中有些人物间发生的男女之情，也是理性无法解释的，如彩云之于贾环的专注之情，龄官对于贾蔷的一片痴情。

贾环的顽劣、无恶不作，几乎到了人见人厌的地步，但偏偏丫鬟彩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愿意为他作奸犯科，去偷王夫人的东西。贾蔷作为纨绔子弟的恶俗，在与贾蓉一起作弄好色的贾瑞时暴露无遗，但他既赢得了心气高傲的龄官的一片痴情，在蔷薇架下的泥土中反复划一个“蔷”字，同时，贾蔷也把自己的一片真情献给了龄官，尽管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龄官那渴慕自由的深刻心思。

男女之情在《红楼梦》中虽然占有最大的比重，但没有缺席的亲情、友情，在《红楼梦》中同样有着耐人寻味的呈现。

王熙凤与秦可卿虽是亲戚关系，但感情之深，又非比寻常。当秦可卿不幸夭折时，王熙凤为宁国府协办丧事，其中有一段写早起进宁国府而先到可卿灵前祭拜，极为传神：

凤姐缓缓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了棺材，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落下来。院中许多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得一声：“供奉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一时贾珍尤氏遣

人入劝，凤姐方才止住。

当凤姐看见棺材，眼泪如断线之珠滚落下来时，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而当她吩咐烧纸，丧乐奏响时，她开始发声哭泣，这可以说依然有真情的宣泄，但也是礼仪的呈现，并以这种外现的礼仪，给了周边人一个暗示，需要有相应的礼仪来配合。于是接下来写一句“里外男女上下，都忙忙接声嚎哭”，注意，“忙忙”还有“接声”，加上重在声音而非泪水的“嚎哭”，似乎也暗示了周边之人的哭，似乎不在礼仪的实践中，已经缺少了相应的情感内核。那么，缺乏了情感

的礼仪还具有多大巩固人伦的意义？抑或仅仅是彰显了人性之虚伪？由此带给我们思考的是，本来是后天建构的礼仪，不但未能规范情感的泛滥，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反而拖累到情感而使之不自然、变得可疑起来。

与此相对照的是，探春对自己的生身母亲赵姨娘包庇舅舅赵国基等并不流露出丝毫的同情，那种基于主子立场而对本质上还是奴才身份的人自觉划清界限，完全恪守了礼仪规范的言行，是否也有着对内心自然情感的压抑？而抄检大观园事件发生时，探春又以主子身份保护自己的丫鬟，这里仅仅是考虑了礼仪要求的主奴互相支撑，还是有情感因素在？类似的问题，成了《红楼梦》对主要人物的人伦情感关系的基本思考。这也常常是西方的“情感学转向”中，许多学者会认真探究的问题。

其实，人的恰当言行出于生命的自然还是外在礼仪的建构，或者如何让情感与礼仪两者没有违和感，不但是西方情感学研究者一直思考探究的，也是早

期儒家学派创立者所思考的。《礼记·檀弓》中记录下一个生动的事例：

鲁人有朝祥(“祥”指服丧期满)而莫(暮)歌者，于路笑之。夫子曰：“由(即子路)！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超过)月则其善也。”

据史书记载，子路是一个自觉恪守礼仪之人，这种恪守是那么彻底，也许已经跟他内心的情感没有任何违和感，所以他会讥笑一个早晨刚刚服丧期满的人，晚上就急不可耐地去唱歌娱乐了。既然相距时间这么短，那么守制服丧，似乎就成了一种纯粹外在的强迫，其内心的悲伤情绪，应该已经荡然，由此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服丧的虚伪性。但孔子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微妙，他一方面批评子路对别人的苛责，认为一个人能够坚持服丧三年，已经很不容易。但同时，他又希望人们能够在服丧期满和娱乐活动间，有一个更长的时间间隔，因为只有娱乐的时间延宕，才多少说明了，不但其悲伤的情感是真实的，就是对服丧礼仪的执行，也是真诚的，是丝毫不勉强的。

正是早期儒家倡导的礼仪与情感的二元组合，那种在现实的对峙紧张乃至断裂中依然思考可能的和谐关系，经过文化历史的递相嬗变，成为《红楼梦》小说展开的基本命题，并呈现为丰富多彩的人物谱系，形塑成传统社会晚期的礼仪文化，也是情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